

我想和鸟一起飞

■张华



《从中鸟：观鸟的社会史》[英]斯蒂芬·莫斯著，刘天天、王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作者斯蒂芬·莫斯(Stephen Moss)，英国作家，BBC自然频道观鸟节目的制片人，在《卫报》开设观鸟专栏，著有《多本博物学著作》。

本书是第一本追溯大西洋两岸观鸟运动之发展演变的著作，全书由17个关键词和丰富、生动的故事刻画出人们对鸟类态度的转变，全面再现观鸟如何由一种个人消遣发展为有组织的群体活动，并最终成为产值达几十亿美元的特殊产业之过程。

1978年秋，两个英国小伙子带着双筒望远镜，横穿欧亚大陆，抵达印度、泰国等地。这段史诗般的旅程的目的，就是观鸟。在10个月时间里，他们经历了种种烦心事，如钱和靴子被偷、身患疟疾、遭狗咬伤，甚至还被拘留过一段时间，“罪名是观鸟时距离一个军营太近”。当然，他们得到的回报也是丰厚的，那就是共看到了1000种左右的鸟，其中大多数是前所未有的。

说真的，当我读到《从中鸟：观鸟的社会史》(以下简称《从中鸟》)中绘声绘色讲述的这个故事后，当天晚上竟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正所谓“热血沸腾”，老夫聊发少年狂，也想着要像这两个年轻人一样，什么时候去“玩票大的”，抛开一切，出门去看一年鸟。当然，我的“务实”之处在于，我不去穿越欧亚大陆，而只是想在自己的家乡即浙江省境内观(拍)鸟一年，想来这也是一件十分有趣和有意义的事儿。

我们读过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战争史、文明史之类，但谁曾想到居然还有观鸟史？而《从中鸟》正是一本难得一见的观鸟史，它重点讲述了现代观鸟的起源——英国的观鸟历史，从“鸟类学先驱”，18世纪的乡村牧师吉尔伯特·怀特和他的鼎鼎大名的《塞耳彭博物志》说起，讲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鸟类“收集”(实际上就是猎杀，尽管有不少是出于研究的需要)与保护，还谈了不少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观鸟逸事，最后甚至还分析了现代观鸟的商业效应。总之，一路娓娓道来，全是“鸟人鸟事”，读来十分有趣。此书的中译本于2019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第一时间拿到了这本书。由于事务繁忙，我主要是在上下班的地铁里读它，由于看得入迷，好几次竟差点坐过了站。

此书的作者是美国作家斯蒂芬·莫斯(Stephen Moss)。说起来，在爱好与某些生活经历方面，我跟莫斯还颇有相似之处：即我们都是资深观鸟爱好者——或者，按照国内的说法，叫作“鸟人”；我们都出版过关于鸟类的书，甚至也都热衷于向公众介绍、普及

关于野生鸟类的故事与知识。

因此，我读《从中鸟》里的不少故事，完全是感同身受，就好像书里是在讲述自己或同样爱好观鸟的朋友的事情似的。就像书中说的，哪怕是在得风气之先(为了消遣而观鸟)的英国，长期以来，观鸟也是一种让人觉得古怪的行为。在中国，观鸟爱好者队伍逐渐壮大是最近20多年的事，普通大众对手持望远镜或“大炮”(超长焦镜头)的“鬼鬼祟祟”的“鸟人”自然尤为警惕。几年前，我和朋友去城郊山里观鸟，误入军事禁区附近，也差点被军人当场“缴械”(收走望远镜与摄影器材)；也曾被村民误认为是记者或“为了搞拆迁而来做测量调查”的。总之，种种误解，常让人哭笑不得。

不过，抛开这些误解不谈，观鸟本身确实具有极大的魅力。书中引述了一件发生在二战期间的跟观鸟有关的逸事。当时，英国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曾负责策划克大撤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观鸟迷，“即便是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艾伦布鲁克也找出时间来观鸟”。据称，他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后任美国总统)关系变得融洽，缘于一件“小事”。

有一天，艾伦布鲁克偶然向艾森豪威尔提到，说他曾千方百计地想要得到《鸟之书》，但是被告知此书已经绝版了。两天之后，这本书就在美国找到了，横跨大西洋递送，还附着艾森豪威尔的问候交付给了艾伦布鲁克。两人之间的拘谨就此结束，从那时起他们开始以“布鲁克”和“艾克”互称了。

德国投降后的那个夏天，艾伦布鲁克结识了当时英国著名的鸟类摄影师埃里克·霍斯金，两人曾多次一起去观鸟、拍鸟。书中风趣地说：

上层中产阶级军官和工人阶级摄影师之间的交往在那个时代并不常见，但是分享兴趣，特别是对于鸟的兴趣，有助于打破社会壁垒。霍斯金并没有被他同伴的社会地位所吓倒：有一次，陆军元帅在隐蔽处弄出了很多噪音，霍斯金毫不含糊地告诉他闭嘴！

我读到这里，忍不住笑出了声。确实，在观

鸟“有助于打破社会壁垒”这一方面，我也深有体会。最近十几年，我认识了国内很多“鸟人”，他们有的属于普通工薪阶层，有的是超级富豪，但不管如何，“鸟儿面前人人平等”：大家只关心鸟，以找到“好鸟”(珍稀鸟类)、拍到“好鸟好片”而论英雄，其余一概不管。

近些年，观鸟作为一种爱好、一种户外休闲运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时尚。推而广之，不仅是观鸟，其他类似的自然观察活动，如认识植物、欣赏野花、拍摄昆虫、夜探自然等，都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目前，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学会的会员已超过100万人，这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在中国，“鸟人”的数量虽然没有那么多，但也是逐渐从少到多，尤其在最近几年里几乎是呈几何级数增长。

与此同时，至少在国内发达地区，如今多数公众已不再把观鸟看成一种另类行为。相反，自然教育正逐渐成为一股风尚。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跟着有经验的老师，学着去观鸟、赏花、看虫，其目的正是企图重建人与自然的联系，让孩子的身心得到更好的发展。

正因如此，我相信，《从中鸟》将不仅会是一本“鸟人”们爱看的书，也会是很多热爱大自然的人爱看的书。因为，正所谓“爱自然的灵魂总会相遇”，在书中，大家一定能找到很多类似的有趣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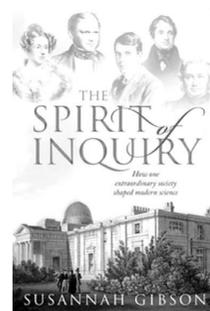
热爱自然的人，必然也是热爱生命、崇尚自由的人。我很喜欢在《从中鸟》第九章的结尾部分，作者所引述的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文字：

你这样的自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在你的业余时间中做你喜欢的事，选择适合自己的消遣而不是有人在你上面帮你进行选择。

我觉得，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一种个性、一种自由，也是一种可贵的能力。来，让我们的灵魂和鸟一起飞！

(作者系宁波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

域外



剑桥哲学学会的历史功绩

英国高等教育的两座高峰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2019年2月28日，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科学史家Susannah Gibson(苏珊娜·吉布森)的著作，《The Spirit of Inquiry: How One Extraordinary Society Shaped Modern Science》(本文作者译为“探究精神：一个非凡的社团如何塑造了现代科学”)。这个社团指的就是剑桥哲学学会，到今年已经成立200年了。

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化学、生理学和实验哲学之教学与科研曾经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两校在建校800多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主要培养的是神职人员。后来，事情在慢慢变化。比如，自1861年起，剑桥大学的本科生得以获得三年制的自然科学学位。1873年，剑桥大学建立的第一个先进的物理学实验室——卡文迪许实验室即落成，而创立该实验室的物理学教授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在这一年发表了永垂史册的著作《电磁理论》。这些变化是怎么来的呢？

本书作者吉布森认为，这些变化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剑桥哲学学会，是该学会将剑桥大学改造为世界领先的科研中心。在19世纪初，science(科学)这个词尚未获得我们目前所理解的意义，scientist(科学家)这个词也尚未问世。直到1833年，scientist一词才被威廉·惠威尔造出来，而他正是剑桥哲学学会的会员。

那时，英国各地(从普利茅斯到格拉斯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很多哲学学会。爱好探究且付得起会费的会员们不时地聚会，聆听关于最新发现与发明的各种演讲，演讲主题五花八门，从化石收藏到蒸汽机推动的火车。纽卡斯尔和布里斯托尔的哲学学会很早就向女性敞开大门，理念相当先进。

剑桥哲学学会与以上学会有所不同。该学会于1819年由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Adam Sedgwick(亚当·塞奇威克)和他的博物学家朋友John Stevens Henslow(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他是达尔文开展博物学研究的领路人之一)两人创办，规定只有本校毕业生才有资格成为会员。学会的宗旨是“促进科学探究，……推动与哲学进展相关的事实之传播”。学会每隔两周用晚上的时间聚会一次，会议内容包括演讲与实验演示。该学会还发行自己的多种科学期刊，这些期刊在当时颇有影响，能与伦敦皇家学会发行的期刊平分秋色。

在该学会的会议上首先披露的重大科学发现还是不少的。例如，达尔文乘坐贝格尔号进行科学考察期间写了不少富含科学内容的信件，1835年11月，亨斯洛向会员们宣读了这些信件，当时达尔文正在塔希提岛考察。在这里首度披露的物理学成果尤其多：J.J.汤姆森发现了电子的阴极射线实验；劳伦斯·布拉格发现的晶体X射线衍射定律；查尔斯·威尔逊关于云室的发明；鲁道夫·佩尔斯特对浓缩铀发生链式反应所需要的临界质量的估算；等等。

剑桥大学的活跃科研人员几乎全是该学会的会员。因此，在学会会议上崭露头角的年轻会员日后获得大学教职的机会也更大。由于在学会发生的双向互动，课程体系逐渐改革了本科学科，将实验科学纳入到课程体系中。该学会还开始了对科研的正式支持，表现为设立实验室、建立科研资助金制度、开创研究生制度等。为支持剑桥大学建立动物学博物馆，剑桥哲学学会将自己整理有序的宝贵标本(包括达尔文随贝格尔号航行期间采集的鱼类标本)都捐献了出来。

该学会还建立了期刊交换制度，与世界各地的著名学术机构(如美国哲学学会和法兰西学会)定期交换学术期刊。通过该措施，他们用很低的成本建立了品种丰富的期刊馆藏。后来，由于财务管理不当造成经费拮据，剑桥哲学学会无奈之下只好出售房产，那么大量馆藏期刊就无处安身了。危难之际，剑桥大学提供了大量空间来托管存放这些期刊。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宝贵的早期科学文献正式纳入剑桥大学图书馆的馆藏。

最初，学会只允许会员携带女宾出席学会组织的活动，但学会并不接纳女性会员。学会创始人之一塞奇威克于1831年间竭尽全力想把女数学家玛丽·萨默维尔(我在2015年2月27日的《中国科学报》发表过介绍她的短文)发展为会员，最终失败了。1871年，Alice Johnson成为在该学会发表科学演讲的第一位女性，讲的是鸟类和恐龙的比较解剖学。直到1929年，剑桥哲学学会终于接纳女性会员了，此举比英国皇家学会要早16年，比剑桥大学首次向女性颁发完整的荣誉学位要早19年。

为写作此书，吉布森开展了详尽的档案研究。她梳理了大量的信件、会议备忘录、账目、标本目录和期刊目录等。她认为，剑桥哲学学会可以被视作当时科学事业的一个缩影。直到两年后的今天，剑桥哲学学会仍坚持每两周搞一次活动，不过，它目前关注的主要不是最新科研成果发布，而是科普。该学会还向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科研人员提供科研资助。

一种做法，200年不变，反映出英国人是怎么酷爱传统。不要以为“传统”就是“创新”的对立面。英国若不是如此珍视科学传统，怎么会迄今仍为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仅次于美国的科学强国？

“他什么都批判”

■韩连庆

2017年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哲学家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新书《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Technosystem: the Social Life of Reason)，我当即买下了一本。我并不是芬伯格的“铁粉”，这些年来一直关注他，主要出于私人原因。我当初选择哲学的时候是想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青睐法兰克福学派，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有研究这个方向，这倒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读博士期间，我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而芬伯格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马尔库塞的弟子，他的著作以技术为切入点，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虽然当初翻译《技术批判理论》是当任务接下来的，但也算尽了我的心血。

记得2004年芬伯格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在东北大学演讲，在场的听众不解他为何频频为马尔库塞辩护，后来在提问环节才搞明白他是在为“师者”讲。当时东北大学的招待所条件还不是太好，热水定点供应，早餐的主食只有馒头，惹得芬伯格频频抱怨，接待人员只能自嘲道：“他是搞批判理论的，他什么都批判！”芬伯格有胃病，吃不了馒头，早餐时我们都在吃饭，他坐在旁边，手里“盘”着个馒头跟我们聊天。晚上我带他去超市买了些面包，才算解决了他的早餐问题。

这几年来，芬伯格的书籍陆续翻译成中文，《可选择的现代性》《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历史的灾难与救赎》《在经验与理性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他的《追问技术》有出版社早做过中文版的预告，但一直没见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马克思、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有人在翻译，《技术体系》出版没多久，中译本也很快出版了。

芬伯格把他最近的立场总结为“批判的建构论”(critical constructivism)，试图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建构论方法结合起来，使技术批判理论更具体和更具有经验意义，强调社会的因素在技术的设计和中的作用。由此出发，通过技术的使用者和相关利益者的民主参与，可以改变技术的设计和路径。

芬伯格在他的不同著作中讨论过这些问题的时候，总是有重复的部分，比如《技术体系》的第四章是个案例研究，讨论的是互联网，而他在《可选择的现代性》中也详细讨论过相关问题，尽管随着这几年互联网的发展，芬伯格也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技术体系》的第一章是讨论马克思和福柯的，这部分内容在此前的《技术批判理论》中已经详细讨论过。

马克思和福柯之间的关系是我最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兴时，很多经济学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分析上，芬伯格将这一观点归结为“技术的设计批判”，认为一部分人的利益主导了技术的设计，压制或者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芬伯格认为，马克思只是将他的这种分析局限在工厂的范围内，而福柯却将这种方法加以概括，形成了他的“知识即权力”的理论，用于分析一般的社会现象，例如监狱、军队、医院、学校等。这样一来，社会的律令就被体验为技术的限制，而非政治的压制。对此，芬伯格写道：

“Those constraints are embodied in systems that determine individuals' actions more effectively than political authority by determining their reflexes, skills, and attitudes.”(英文原版第21页)

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些限制体现在

(技术)体系中，通过决定个人的本能反应、技能和态度。(技术)体系相比政治权威更有效地决定个人的行为。”《技术体系》的中译本将这句话翻译为：“这些限制被嵌入这些体系中，这些体系比通过决定它们的能力、技巧和态度而产生的政治权威更有效地决定着个人的行动。(中译本第31页)译者好像没有读懂这个复句。

由此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和福柯对社会现象都持有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观点。福柯认为，事物的背后“并没有一个永恒而重要的秘密”，而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道：“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对此，芬伯格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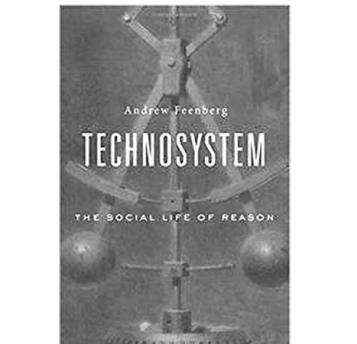
“This passage distinguishes the thing qua thing from its mea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英文原版第28页)

“这段话区分了作为事物的事物和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含义。”如此简单的一句话，中译本竟然翻译成“这段话文字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区分了作为事物的事物”(中译本第42页)。我都怀疑这是用翻译软件翻译的。

马克思和福柯不仅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类似，而且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有类似之处。对此，芬伯格写道：

“What in Marx is class interest, struggle, and consciousness finds its parallel in Foucault's notion of an inherent resistance of life to power guided by 'subjugated knowledges' reflecting the experience of subordinate participants in sociotechnical networks.”(英文本第34页)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马克思那里的阶级利益、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类似福柯的生命对



权力的内在抵抗的观念，这种抵抗是由“被压制的知识”引导的，而这些“被压制的知识”反映了社会技术网络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参与者的经验。”“被压制的知识”指的是技术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经验，但在技术的设计中，却被当作外行的经验而不予考虑。中译本把这段话翻译为：“马克思的阶级利益、斗争和意识概念，类似于福柯的生活对权力的固有抵抗概念，而权力受‘征服性知识’的引导，‘征服性知识’又反映了其参与者在社会技术网络中的体验。(中译本第51页)译者好像又没读懂这个简单的复句。

芬伯格的不好翻译。有一次我到日本东京大学开会，碰到芬伯格的《追问技术》的日文版译者，他也跟我抱怨过。我当年不知深浅，贸然翻译了他的《技术批判理论》，虽然学到了很多，但至今汗颜，不敢重读当年的译作。这学期因为给研究生上“技术批判理论”的课程，仔细阅读了《技术体系》的原书和中译本，很喜欢这本书，希望能读到比较通顺的中译本，倒是没有给人“改作业”的嗜好。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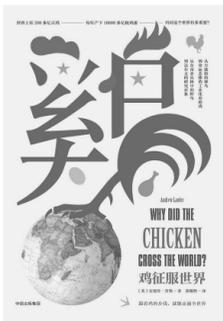
微评

尹焯(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CEO)
评《鸡征服世界》

把鸡的故事讲成了一本书，有意思。书中告诉我们，鸡是全球数量最多的鸟类。世界上有200多亿只鸡，而排在鸟类数量第二名的红嘴奎利亚雀，数量只有鸡的1/10。对于人类而言，鸡是仅次于狗的动物。这种起源于南亚灌木丛中的鸟类，在经过层层筛选，源源不断传递自己基因的同时，也成为了人类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这不仅是因为鸡肉乃营养学上为人称道的“白肉”，还因为鸡每年可供给1万亿颗以上的蛋。

另外，这本书的案例还是比较“热闹”的，从鸡蛋对病毒研究的贡献谈到斗鸡历史，从家鸡的起源和演化推演到与人类迁徙的配合。或许，从鸡的角度看世界，能令我们更加客观。

不过，虽然本书也提到了基因，主要讨论的却是红原鸡以及家鸡和野鸡之间的“杂交”，没有提及2004年完成的著名的家鸡基



著：美安德，2017年9月出版

因组计划。这个计划研究了英国肉鸡、瑞典蛋鸡和中国乌鸡，而中国部分也是华大基因和北京基因组所主要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这还是英国首相布朗所支持的项目。

此外，鸡屁股在免疫学上发挥奠基作用，也是医学史上一段为天津津道乐的故事。如果能把这部分内容详细补充，会更增趣味性。

吴宝俊(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普策划人)
评《一分钟物理》

大约3年前，中科院物理所魏红祥老师向我说起要在物理所官方微信开设问答专栏。我问网友提问，我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进入互联网时代至今，还没有哪个科研单位以如此直接的方式向公众敞开怀抱，接受网民的挑战。干这种别人没干过的事儿，刺激！但我心里也有一丝担忧，毕竟物理所是科研单位，科研是老师和同学的正业，回答大量网民提问，必定需要占用很多时间，更何况网民的身份复杂，提的问题也是千奇百怪。物理所能应付得过来吗？

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是多余的，栏目一开，广大网友和所里的老师同学们同时“开挂”，问题千奇百怪，回答精彩纷呈。

为什么泡泡没有方的？为什么太阳中午是白色的，傍晚是橙色的？为什么腊八蒜会变绿？北极的冰屋真的不冷吗？为什么纸沾上油就会变透明？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十万个为



著：梁俊，2019年3月出版

什么，网民和科学家在微信端的互动中实现科学知识的趣味传播，物理所的微信公众号也在这样的狂欢中打开用户突破50万。

现在，问答栏目整理成书，取名为《1分钟物理》，以纸质方式延续这个传统，把有趣的问题和答案带给更多人。这事儿，我觉得，好！这本书，我觉得，赞！还等什么？买！